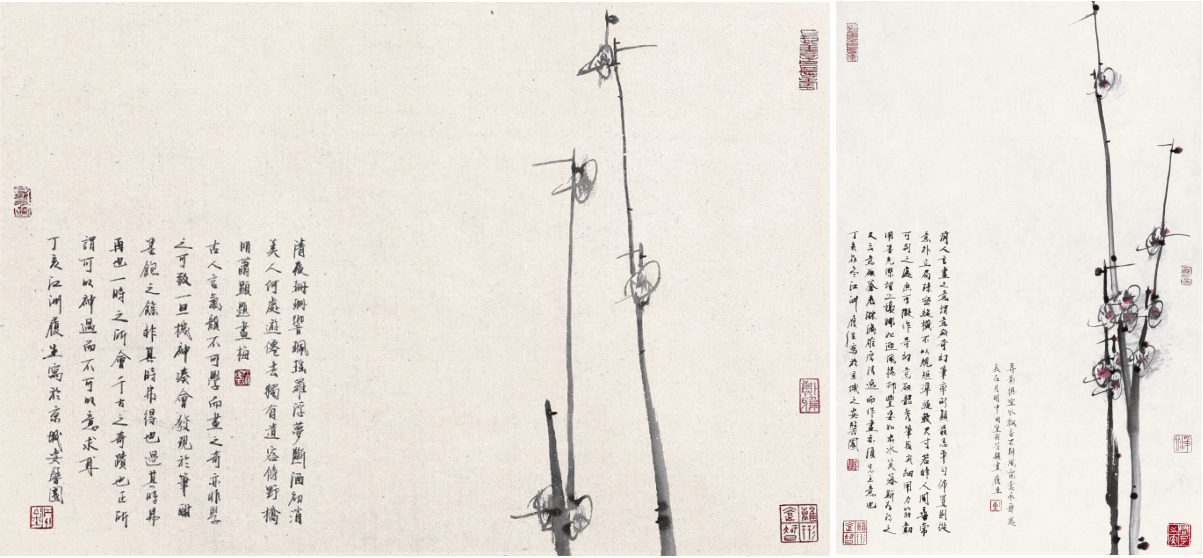


■第一阅读



我的梅花之缘

□陈履生

1978年,为着自己的理想,我和许多考生一起坐到了镇江市一所中学的考场内,参加南京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考考生时,一进考场,就看到考场内有几盆说不上名字的花,这可难为了这些乡下人。按理说,就我父亲在扬中岛上侍弄花的名声,应该不会陌生。在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县城边上,我的家里有一个小花园,父亲几乎把他的业余爱好都倾注在这里。他有一株最为得意的梅花,还有各种品牌的月季花,这都是他的最爱。当然,在我家的花园里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花卉。可以说,我是看着父亲侍弄花长大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父亲经营的照相馆的楼上,住到了乡下的家里,因此,小花园也就逐渐有了规模。可是不久,父亲被关到学习班里,有时很久不能回家,但是,他如果有一天或半日回家的时间,一回到家就先看他的花,并及时地浇水、施肥,以弥补一段时间不能料理的缺憾。每每如此,辛劳的母亲都给予了各个方面的宽容。在当时,人们还在为温饱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哪有闲心侍弄这些花草,因此,我家的花的数量是全县最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实际上,这里所谓的“最多”是非常有限,我在写生考试中遇到的尴尬,就是很好的说明。那时候,这些花花草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它们有缘的人好像都有点思想问题,所以,养花的人并不多。而我一直不解的是,父亲的这一兴趣从何而来,我爷爷对此则兴趣索然,爷爷种他的丝瓜和蔬菜,比较务实。那时候,家里还是经常有一些喜欢花的人来参观,和我父亲交流。每每看到此情景,我都为父亲感到骄傲。所以,当我看到考场内这种不知名的花时,一下子就蒙了,只好稀里糊涂地画完写生,当然,我还是按照规律画出了此花的结构以及情态。实际上,不知道花的名字并不影响表现,但

是,画自己熟悉的花总比画没有见过的花要好,因为这是考试。回到家后,我把花的形状给父亲做了比画,父亲告诉我那是夹竹桃,并于不久买了一株栽到了花园里,至今这棵夹竹桃历20余年已经粗壮硕大,像一棵树一样。那一年的创作试题是《俏也不争春》,这是取材于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中的一句话,此前在全国美展里有一幅关山月同名的作品,满纸都是红梅,因此,我知道考试要切题应该画梅花。所以,我在一个竖构图的画面中,在冰封的悬崖峭壁上画了一株梅花。后来,我曾经复制了这一画面,贴在三门橱中间的位置上,告诉家人和朋友,我就是靠这张画、靠这株梅花考上大学的。

“文革”的时候,常以毛泽东的诗词作为春联,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如此等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当时的花鸟画也只能以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义为主要的题材,但是,梅花有多种,其中腊梅是黄色的,这一颜色与红色的年代却不相吻合,因此,只有各种红梅大行其道。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我在考试时作《俏也不争春》这一命题画的时候,还是画的红梅。回想起来值得玩味,梅花同样是“欢喜漫天雪”,但就不能画黄色的那种。实际上我在画红梅之前一直没有见过红梅,而我家却有一株黄色的腊梅,复瓣。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人就是说不清家里的梅花是多少岁数,只知道父亲每年锲而不舍地为其周围的野梅嫁接,我印象里也就只成活过一两株。每年冬月,眼瞅着梅花在寒风中、雨雪中绽放,芳香扑鼻。在新年到来之前,全家人都围在梅花的前面折枝,每年要折很多,折下来之后的分配是一件大事,每人都对梅花的数量以及枝干的形态,挑肥拣瘦,并常有分歧。各有所得之后,先把枝干的尾部泡在水里,藏在床底下。因为左邻右舍、

■尚书房

安详视野中的《弟子规》：回“家”

——与华一欣先生对话

□郭文斌

做保障的快乐,如果一种快乐它还需要条件,那就不是安详。安详和快乐一体两面,就像我们拿到了一百块钱的正面,就意味着我们同时拿到了它的背面。

快乐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无上的尊严。如果一个人从孝敬中体会不到快乐,那么孝敬就无法走近;如果一个人从尊师中体会不到快乐,那么尊师重道的倡导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果一个人从奉献中体会不到快乐,那么奉献就会成为一种作秀;如果一个官员从廉洁中体会不到快乐,那么反腐倡廉就会永远成为一个难题……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要让官员不贪就要让他找到一个比贪更快乐的东西,要让一个孩子不学坏就要让他找到比学坏更快乐的东西,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

我孝敬是因为我快乐,我尊师是因为我快乐,我学习是因为我快乐,我环保是因为我快乐,我奉献是因为我快乐,我安详是因为我快乐。

这既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也是道德的意义所在。否则,道德就有可能是一个虚伪和欺骗,学问就有可能是一个虚伪和欺骗,生命就有可能是一个虚伪和欺骗。

华一欣:安详这么重要?

郭文斌:对,如果我们和安详错过,就是和喜悦错过,和时间错过,最终和生命错过。生命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亏损。不管我们绘制多么宏伟的蓝图,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如果属于喜悦的账面上有出无进,那我们肯定在和生命错过。

现代人的共同体会是离幸福越来越远,却不知从欲望中寻找幸福犹如缘木求鱼,用物质解决心灵疾患犹如拿油灭火。

刺激欲望不但不会解决我们的心灵饥渴,反而火上浇油,只有水一般纯净的安详才能真正浇灭燃烧在人们心头的火焰。

一列列车,如果方向正确,速度越快

越好;假如相反,越快越糟糕。细节决定成败,方向更加决定成败。生命的绚烂和精彩,快乐和幸福,固然来自细节,更来自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于生命来说,安详既是目的,又是方向。

华一欣:那么,您说的安详与传统蒙学读物《弟子规》又有什么内在关系呢?

郭文斌:关系紧密。如果一个人向外寻找幸福,生生世世也找不到幸福。现代人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本身带着幸福的车子却满世界寻找幸福,最后把车子都开爆了,最终却和幸福擦肩而过。

当一个人内心存有安详,仅仅从一餐一饮、半丝半缕中,就可以感受到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否则,即使他拥有世界,也可能和幸福无缘。

因此,安详既能给富人提供心灵着陆,又能给穷人提供心灵温暖。

中华民族的古传统是向“内”寻找幸福,因为幸福就是我们“本身”,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向“外”看,那束天生的打量幸福的目光已经永久睡眠。

正因为这种向“内”寻找幸福的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和灿烂,也造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基本的社会稳定和安宁。

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推行《弟子规》的意义所在。

《弟子规》共360句,113件事,本质上是给我们提供了113个回家的入口。

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又是家本身;安详是全然的喜悦,无条件的快乐;安详既是生命的方向,也是生命的目的。

让我们一同在安详中获得生命的尊严和幸福。

华一欣:那么,您是如何提出安详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您的安详思想呢?

郭文斌:打开每天的报纸、网站、电视,重要位置多被天灾人祸占着,触目惊心。而这些天灾人祸又以惊人的速度更新着,人们甚至来不及记住标题,就被新

书香中国

亲戚朋友来要的很多,甚至还有去年的订货,往往供不应求,顾此失彼,所以只能择其主要。等到外面的树上已经光秃秃的时候,来人只好晚之晚来一步,作来年之想。等到春节前几天,家人才把床底下的梅花拿出来,随便找一个罐和一个盆插在里面,一个正月里,整个房间里飘荡着芳香。那时候对于梅花的感受,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可以琢磨得让人感到累的文化内涵,既没有诗情,也没有画意,就是知道香。真是淳朴。而插梅花的器皿全然没有任何讲究,却和当时的环境十分协调,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如果在那个环境中弄一个官窑的青花瓶也不见得高贵典雅。虽然我自从小就喜欢梅花,喜欢梅花沁人心脾的芳香,但是我在学画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画过梅花,也没有接触到什么画谱。那时候什么画谱也没有。所以,我考试时候画的梅花一定是概念化的瞎画。

考试的时候连写生的花叫什么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我,后来居然当上了花鸟画的课代表。任课的是刘菊清老师,她是著名花鸟画家陈之佛先生的学生。刘菊清老师在教学上极其认真,富有理想主义,培养了许多当代的小有名气的花鸟画家,却耽误了她自己在绘画事业上的发展。她在花鸟画专业上既重视传统又强调写生的思想,使她的许多学生受益匪浅。尽管她自己没有子女,但她总是把她的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严格得让学生怕她。她又非常热情地帮助她的学生,热情得让人无法理解。我们这一个班的19名同学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有了一次山东菏泽的牡丹写生之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都带着行李,吃住在老乡家里。早晨起来吃完饭后,带上两个馒头一壶水,就坐上了一望无际的牡丹地里,一坐就是一天,面对牡丹画白描写生。菏泽的牡丹虽然比其他地方的牡丹更显雍容,但是,并不显富贵。因为这里的牡丹实在是太多,满眼都是,多到让你想起那些公园花房里的牡丹孤苦伶仃的实在可怜,因此,菏泽的牡丹有点像落入平常家的王谢堂前燕的感觉。晚上,同学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互相观摩,刘菊清老师再作点评。尽管她白天轮番在同学之间指导,可是,晚上她还是不断地讲。我们还经常到中山陵植物园里写生,现在想想实在不可思议,我们的专业不是国画,却有那么多的花鸟画课。我们被老师安排上了那么多的绘画课,而染织专业的老师们因时常敲打我们“专业思想不牢固”。写意花鸟课的课时不多,任课的是高冠华老师,他是潘天寿先生的弟子。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刚落实政策从南通到南京,一时也得不到重用,所以只好教我们这些非专业的学生。由于有人学考试时画梅花的经历,那时候上写意花鸟课就比较多的画梅花,特别倾力于《芥子园画谱》,为此,我和几位同学还让高冠华老师生气,他是不主张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本科毕业之后,我有了新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让刘菊清老师和其他专业老师为之失望。进入到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就基本上不玩笔墨了,开始读书。后来的十余年里,我把很多的时间都用在敲击电脑的键盘上,写了一些文章,出了几本书。但是,偶尔有一些聚会的机会,友人们要让我当众献丑,只好以梅花应付。无心插柳,虽然没有成荫,但是,我对梅花却有了一些笔墨上的认识,也由被动化为主动。这里的作品就是我对梅花的理解,对梅花的认识,同时也是我的笔墨。

(摘自《陈履生画集》,陈都编,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8月出版)



的天灾人祸顶掉。就连天灾人祸都是如此匆忙,如此席不暇暖。

为什么?在我看来,天灾是因为自然失去了安详,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安详。为此,2006年我提出了安详的概念,并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实践。

安详旨在帮助现代人找回丢失的幸福,让人们在最朴素最平常的生活现场找到并体会生命最大的快乐。

当一个人能够回到现场,获得现场感,那么我们就会在最简单最朴素的生活中心体会到最丰饶最盛大的快乐。

安详是让我们进入时间,只有进入时间,人才会告别焦虑,才会告别无意义感带来的生命根本痛苦。

疾病来自对安详的缺失,或者说是安详的断路。安详不在现场,就像一个人灵魂一旦离开,就要开始腐烂。安详是快乐的灵魂,也是健康的灵魂。

这些句子,或被传媒摘引,或被人们作为短信互相转发。

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安详对人具有神奇的“改变”作用,在安详的影响下,不少问题学生得以改变,不少问题家庭得以改变,不少心灵疾患得以痊愈。领导们反映,听完报告之后,职工会变得敬业起来,快乐起来。为此,每逢我们搞一些公益活动,那些从中受益的同志会闻风前来做义工。一些没有安排讲座的学校,学生家长要求学校邀请,为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听到一堂关于安详和人生根本幸福的演说。

安详之所以如此受到大家欢迎,大概是因为它正好应对了现代人最大的痛苦。

(摘自《〈弟子规〉到底说什么》,郭文斌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

■书斋札记

贾平凹说:“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这句也许并非很逻辑的话却击中了作家王勇英的心灵,她由此展开了漫长而持久的回忆。就像青寻寻找当年插队时的“情人”一样,王勇英开始了事无巨细来,如痴如醉的追寻。于是,童年的每一种劳作、每一件物事都得到了极细微的张扬,害得我这个农人的儿子读来是津津有味,竟常常忘却了时空的存在。这是读王勇英儿童文学作品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有一种记忆就被它牵扯到了遥远的乡下,遥远的童年,那里有嬉戏与眼泪,有童谣与山歌,有乡村老师与庄稼汉,更有那做不完的农活与游戏,那说不尽的欢笑与快乐。犁田的牛出现了,鱼和泥鳅也跑出来了,还有那忠实的狗与山间的鸟。稻田的活计很多,日常的游戏也不落下,如做犁鼓做纸鳊,包粽子捉萤火虫,推磨碾米酿酒,采野菜野菜,养鸡养鸭,捉鱼捉虾……真是能想到的都写上了。说是泥沙俱下也好,说是情不能已也好,反正感情那道闸门是关不住了。

这就是流露了真情的王勇英。虽说她是一位写儿童文学的能手,但她此时已全然忘却了这一点,她只是一味真实地记录下她经历过的每一件乡间的劳作与童年的快乐,她甚至是如此迫不及待,仿佛怕这些琐碎的物事一闪即逝。她也几乎毫不思索地记录,真实到逼真细致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她的生命已经融进去了,她根本无暇顾及旁人,她记录了自己的心灵。

这几乎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日记,它更很大程度上是写给自己的。毕竟,今天的人们还有几个持守着根本与善良呢?还有几个保守住敏感而可贵的心灵呢?知音已经难觅,心灵就被放逐,真正的艺术也就成了私有。

王勇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拒绝了小说的语法与句式,她返回到一种极朴素极单纯的叙述,她只想原汁原味地表达出内心的汹涌波涛,只想细细地寻觅当年乡村情感的层层涟漪。这与其说是为了一种新的艺术的出现,还不如说是为了内心的某种平安与需要而找到了这种表达。

这种表达就这样呈现于我们面前:没有太复杂的人物,没有什么故事,只有讲述;物事是如此密集,一件接一件;节奏是如此快,还没让人喘口气又接着讲了下去。显然,这种记录的优点是很容易的,它率性真实,自然随意,不矫情,不自恋,令人没有阻碍。但在另一方面,也显得随性的多了,组织的少了;表层的多了,深入的少了;琐碎的多了,整体的少了。

童年与回忆是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都在用的一种素材,但用得好的总是凤毛麟角。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就是如何解决好私有与大众的界限,把私有的个人的经验转化为大众的普泛的经验?另一个就是如何解决好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把过去的历史的经验转化为现在的未来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抹平时空的限制,让这种童年与回忆的经验超越时空的限制。只有这样,童年才会引起真正的共鸣,才会走向更深更广的时空。

对于王勇英而言,这些应该都不是难事,但也许是过分沉迷于某种情感之中,她在艺术技巧方面可能因此忽略了一些不该忽略的东西。当然,也正由此,她的“真”与“情”袒露无疑,这又是一种非常公正的补偿。我们因此看到了她的至性至情,看到了一个守望心灵的敏感与善良的人,她的这一组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因此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会让乡村长大的人情不自禁,拍案叫绝。

可贵的显然不是记忆,而是心灵与良心。回忆之所以让人动容,那是因为时空的距离与情感的共鸣。因此,我们写的绝不应该仅仅是童年与回忆,也绝不仅仅是私人的自我陶醉,而应该有更宽广更深远的东西。我也写了相似的东西,也有着与王勇英相通的情感,我知道其中的难处,因此,我愿以此与她共勉。

文学作品更应思考现实

□纳 杨

《人民文学》2011年第9期头条发表的乔叶的非虚构小说《拆楼记》是一篇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文学作品。“拆迁”似已成为当下人们生活中无法跳过的话题,好像所有人都与拆迁有着或多或少的或近或远的关系。“强拆”也成为最能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抓住眼球、制造舆论的热门词眼。之前也看过一些反映拆迁问题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像《拆楼记》这样让我感到意外、新鲜,让我对“拆迁”这件事情有了许多认识,对文学应该如何反映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作者巧妙地主角“我”设定为被拆迁户在城里工作的妹妹,这样,主角即是事件的第三者,因为被拆房子不是她的,同时又是隐藏的当事者,因为拆迁户之一是她的亲姐姐,更因为被拆房子是在她的资助和运作下建起来的,可以说她是拆迁款的直接受益人。当然这层关系外人是不了解的,于是“我”既能以当事者的心态来讲述这一事件,又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获得拆迁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从而实现了对整个事件的相对客观的讲述。

小说把故事设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拆迁案例上,可以说是一次大的拆迁项目的前传。豫北焦作高新区张庄村的一些村民为了赚取拆迁款在即将动工的未路绿化带上违章建房。小说就围绕着管委会要求这部分村民拆除违章建筑这一事件展开。只有一个简要的前情简介,没有人物身份的介绍,没有开场白,没有铺垫,从姐姐给“我”打的一个电话直接就进入了小说正题。这样处理,既符合中篇小说的特点,也让事件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形象更加集中、清晰。

小说透过“我”在这一事件过程中一路走来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写出了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眼前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和争夺利益的各方人物的各种对抗冲突直到最后事件结束后的戏剧性转变的心路。一开始,“我”为了9万块钱的拆迁费积极策动村支书的弟弟带头盖房,力挺姐姐坚持到底,还热心为拆迁户出谋划策,让有文化的赵老师牵头召集拆迁户开会,后来不惜动用工作关系私人关系,找记者,找相关公职人员。但随着对拆迁户的深入了解,随着管委会的见招拆招,破解了“我”的所有招数,“我”最终只能凭借私人关系帮姐姐争取到6万元的补助,还是以宣传费的名义,而这笔数字恰恰是“我”当初鼓动姐姐建房的全部投入。可以说姐姐在这场“战斗”中始终是冲在最前头的,所有来自外界的压力都压在姐姐和姐夫的身上,虽然没有经济损失,但也没有什么经济补偿,而“我”费这么大劲折腾一大圈,让亲姐姐受了这许多罪,却也只是不赔不赚。单从经济角度来看,完全是得不偿失。但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后,“我”和姐姐真的就一点变化都没有吗?当“我”想尽所有办法却依然无果感到百无聊赖辛酸惆怅之时,我仍不想放弃。作者写到:“此时,那几万块钱在我的视野里已经被虚化掉了,周围衍生出一团团色彩斑斓的光晕。不,我不想去也没有能力去分析那一团团光晕的构成,我只是想最大限度地靠近和触摸那些光晕。”

这里,作者所说的光晕应该是做人的尊严。在与管委会的斗智斗勇过程中,时时处处感受到“公家人”对农民拆迁户的轻视蔑视,连“我”都不自觉地对姐姐和她的乡邻们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心。正是因为这不尊重,才会有简单粗暴地对抗,才会激起拆迁户们的不断反抗。其实他们的要求就真的高到无法满足吗?从姐姐拼到最后提出的赔偿款仅仅是6万,而且是为了要还“我”才一再坚持这个数,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要求到底有多高。但是这样的要求就是不能满足。按小说中高新区管委会的一个副主任的说法,可以把钱给拆房的民工,甚至可以扔掉,但就是不能算到拆迁补偿账上,这是原则问题。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写到:“有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此时,如果一定要确认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说:我最知道的是,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这段话是对整个小说的深化。所有人看完这篇小说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我最知道的,是读完这篇小说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

小说最出彩的部分是透过各色人物的嘴,表达出作者对这一社会敏感事件的深层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而这样的思考正是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最大的区别,因为这样的思考不仅有助于读者看清事实,更能启发读者的思考。土地所有问题应该是当前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乔叶敢于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体现出作家应有的气魄和胆识。

如今,人们很难有大块的时间来体会文学作品的意味,很难有沉静的心态来阅读思辨性的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很难有平和的细腻的感情来欣赏优美的文学作品。而像拆迁这样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如果要进入文学作品,势必要经过作家一段时间的积累消化、理解思考,然后才能写成作品,而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具有文学中最吸引人的力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拆楼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真正好的文学作品。

守望童心

□傅 翔